

渤海遗民对辽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

梁玉多¹⁾

渤海是一个在东北亚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民族，辽政权虽然用武力灭亡了渤海，但其社会发展程度却是低于渤海的。渤海遗民对辽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渤海人的这一历史性的贡献，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1、经济方面

① 农业

契丹人本是个游牧民族，不从事农业，“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湊酪，挽强射性，以给日用。”阿保机建国后，比较重视发展农业，但因基础较差，一时难以奏效。而渤海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发展水平较高。考古发掘证明，铁农具已广泛使用，耕作使用畜力，农作物种类已很丰富，仅粮食类就有水稻、谷子（粟）大麦、荞麦、大豆、黍等六种之多。辽代被迁出故土后，到迁入地仍以农业为主。他们的农业生产水平明显高于契丹族。辽政府又实行了开明的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太宗“劝农桑，教纺织”，又“诏征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圣宗下诏：“五稼不登，开帑藏而代民税；螟蝗为灾，罢徭役以恤饥贫”，又“禁诸军官非时畋牧妨农”。²⁾遂使渤海遗民聚居的辽东地区有“编户数十万余，耕垦千里”³⁾与汉族聚居的燕云地区并驾齐驱，是辽的两大粮仓。

辽圣宗太平九年（1029），燕地遇到灾害，发生饥荒，户部副使王嘉奏请造船，招募熟悉海运的水手驾船，把辽东的粮食运往燕地救灾。只是由于廷议认为这条水路太险，没有实行。⁴⁾这表明辽东是有大量的余粮可供输出的。《辽史》有燕地发生饥荒的记事，却没有辽东发生饥荒的记事，足见辽东的农业不仅高产，而且稳产。《辽史》食货志载，“辽东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余仓，

1) 中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 《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

3)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宋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4) 《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

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辽东农业之盛，可见一斑。

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祖宗法”是谁的祖宗法。契丹人本是游牧民族，无农业，其农业是辽王朝建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余仓之法是与成熟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仓储和救济制度，所以不可能是契丹人的“祖宗法”。那么它就只能是辽东居民渤海人的“祖宗法”了。就是说，渤海遗民不仅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方式带到了辽东，也把粮食管理调剂方式带到了辽东，渤海遗民在农业上给契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渤海人还把种植蔬菜的方法传给了契丹人。契丹人本来是“马逐水草，人仰湏酪”，不吃蔬菜。但后来从渤海人那里学会并喜欢上了吃蔬菜。比如从渤海人那里学会种植和食用葵菜。葵菜又名冬寒菜，是一种很古老的蔬菜，至晚到汉代，中原地区已经普遍种植。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东北，渤海时已广泛种植，是渤海人日常最主要的蔬菜，⁵⁾辽兴宗去宰相张俭家，张俭“进葵羹干饭，帝食之美”。⁶⁾渤海与燕云都有葵，所以不能确定辽的葵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但辽先得渤海后得燕云，从渤海传来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在这里姑且认为是从渤海传来的。

在渤海人和汉人的影响下，在辽廷的积极倡导下，整个辽国的农业迅速发展起来了。粮食产量很高，保宁七年（975），北汉乞粮，辽一次就“赐粟二十万斛助之”。道宗初年，“春州斗粟六钱”。粮价如此之低，说明当地粮食很丰富。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⁷⁾这些也不能说与渤海人的影响没有关系。农业的发展，为辽政权提供了巨额的税收，保证了政府的各项开支，稳定了辽王朝的社会基础。

② 冶铁业和铁器制造业

渤海人大量使用铁器，仅上京龙泉府遗址一地就出土铁器1596件。“种类复杂，计有铲、镰、刀、矛、镞、甲片、镊、锁簧、钥匙、碗、盆、镬、带具、车辖、门枢、门鼻、桩、合叶、环、铁钩、钉、钉垫、泡、八角形铁片、锥形器、盔顶、铁条等27种。有的属生产工具、有的属兵器、有的系生活用具、有的为建筑材料”。⁸⁾考古资料证明，渤海的这些铁器，不是从境外输入的。从开采铁矿，到器物制造，都是由渤海人自己完成的。渤海人的冶铁址现在已知的有六处：分别在今吉林省汪清县仲坪乡、⁹⁾和龙县西城乡古城村、¹⁰⁾抚松县松郊乡新安村、和龙县勇化乡惠章村、¹¹⁾俄罗斯滨海地区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¹²⁾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即渤海时代的铁利府。这样规模的冶铁和铁器制造业，必然造就了一支熟练的

5) 梁玉多《발해의 몇 가지 음식습관에 대하여》《韩国古代史研究》42, 서경문화사, 2006.

6) 《辽史》卷八十，张俭传。

7) 《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9)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汪清县文物志》40-41页，1984年内部出版。

10)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卷四十三，文物志 6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139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93年。

12) 沙弗库诺夫等著，宋玉彬译，《数国及其俄罗斯的远东部落》122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工匠队伍,对辽来说,这是最宝贵的。辽政府利用渤海遗民成功地发展了自己的冶铁业。

契丹人本不知冶铁,阿保机建国之初并室韦,才开始用室韦人冶铁。“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做铜、铁器。”¹³⁾但室韦人的冶铁技术水平逊于渤海人,所以辽灭渤海后,又大量使用渤海人冶铁。

辽的较大的冶铁业中心有三个,都是用渤海工匠开采冶炼的。

第一个在今辽阳、鞍山一带。《辽史》食货志下载,“又有曷术部者多铁,曷术国语铁也。部置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黠古斯,曰手山。”曷术部在今辽宁辽阳、鞍山及其以东地区。因为金代有曷苏馆女真,所以一般以为所谓曷术部是女真的一部。但张博泉先生认为,“契丹把大批渤海户迁到辽阳冶铁,被称为曷术部或曷术馆”¹⁴⁾笔者赞同此说。

《辽史》食货志下又载:“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贡纳”。这段记事是《辽史》中诸多错乱之一。铁利州并非原来渤海位于松花江下游的冶铁中心铁利府,它是原渤海铁利府下属广州之民被南迁到辽东后重置的。铁利州在今辽宁抚顺北,辽把原渤海铁利府下属广州的工匠迁来于此,开采当地铁矿冶铁。东平县即今辽阳,既有专业的“采炼者三百户”,亦是一个冶铁业中心。

《辽史》地理志二载,东京道有铁州,为“渤海置州”,统县一,汤池。铁州不是“渤海置州”,而是“移渤海民置州”。既然名为铁州,想必亦有冶铁业,而且必为渤海遗民的冶铁业。关于辽代铁州的位置,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鞍山说,张博泉先生认为铁州下辖的唯一一县汤池即是今鞍山市的汤岗子,有1630年所立之奶奶庙碑为证,其文曰:“辽阳城南鞍山地名汤池”。而且附近恰有古城址,城方形,南北长约一里,东西宽约一里半,当即辽汤池县。¹⁵⁾宋延英先生认为铁州即今鞍山。¹⁶⁾二是大石桥市汤池镇说,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既是这样注释的。笔者认为,此汤池为现代地名,不足为凭,而且附近无铁矿,亦无古代冶铁之遗址遗迹。而鞍山一带不但有铁矿,还发现了古代的熔矿炉遗址和矿坑,在鞍山的首山矿区发现辽代的矿坑二、三处,深度达十八公尺以上。¹⁷⁾综合分析,铁州还以鞍山为是。

第二个在今河北省东北部的滦平、隆化到平泉一带。八世纪末,北宋王曾出使辽国,记述他途中见闻的《王沂公行程录》载:“七十里至柳河馆(今河北省滦平县红旗镇),河在馆旁。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滤沙石,炼得成铁……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馆(今河北省隆化县韩麻营乡),惟有番户百余,编荆为篱,煅铁为军器……九十里至铁浆馆(今河北省平泉县洼子店)”。¹⁸⁾柳河馆、打造部落馆、铁浆馆都有冶铁或铁器加工业。文中虽然没

13)《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

14)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235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

15)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235页。

16)宋延英《辽代铁州地址考》,《历史研究》1953年第8期。

17)穆鸿利《评辽圣宗锐意改革与辽朝“盛世”的出现》,《松漠集》19页,中国国际出版社,2005年。

18)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有明确打造部落馆和铁浆馆工匠的族属。但从上文分析，是渤海人的可能性很大。柳河馆冶铁，即是铁产地，打造部落馆和铁浆馆是铁器加工地，即用柳河馆产出的铁加工制造铁器。这是一个完整的生产链条。

第三个冶铁和铁器制造中心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即辽之饶州。饶州居民绝大多数是渤海人，其下辖长乐县，“太祖伐渤海，迁其民，建县居之。户四千，内一千户纳铁”¹⁹⁾这一千户纳铁户，当然就是从事冶铁业的手工业者了。如以每户二丁计算，则仅长乐县一地就有铁工二千余人，看来这里也是辽的一个冶铁工业中心。在饶州城址，考古工作者发现，“在大城的东门内路北的一处建筑基址上，地表堆积很厚的炼铁渣，估计当是一处冶炼作坊遗址……但整个路南，情况和北城就完全不一样，几乎没有建筑台基址，而是遍地炼铁渣，甚至地面土壤都呈黝黑色，这里当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冶炼遗址”²⁰⁾长乐县与辽上京临潢府很近，所以这里所产之铁无疑是供上京用的。

古人冶铁，在采矿方面有三种方法：一是用土铎铁。土铎铁是象土块一样的铁矿，多为磁铁矿，“土面浮出黑块，形似梓锤，遥望宛然如铁，捻之则碎土。若起冶煎炼，浮者拾之，又乘雨湿之后中耕起土，拾其数寸土内者”。二是沙铁，即细小的，掺杂在沙土中的铁矿，“凡沙铁一抛土膜即现其形，取来淘洗，入炉煎炼，溶化之后与铎铁无二也”。²¹⁾三是象现代开采铁矿一样开凿矿坑。这三种采矿技术，渤海人都已掌握。到辽代他们仍然使用的开采方式是两种。柳河馆工匠的“就河滤沙石，炼得成铁”是典型的滤取沙铁矿。而鞍山等地的辽代矿坑遗址，则证明渤海遗民也开凿矿坑。

渤海人有较为成熟的冶铁技术。在渤海的冶铁遗址中没有发现煤，说明渤海人是用木材或木炭作燃料的。铁矿石熔化为生铁是1146℃，炼成纯铁就是钢则需要1537℃。燃烧木柴或木炭达到1146℃并不难，所以冶炼生铁不难，但要达到1537℃就不那么容易了。渤海人能够炼出较为纯净的铁，说明他们在高炉的保温、炉火的吹风方面有相当的技术。他们的技术是辽代冶铁技术发展的基础。

铁器的制造有两种方法。一是锻造，即把加热软化的铁锤打成所需要的器物。渤海人的锻造技艺较高。俄罗斯学者研究了出土的渤海锻造铁器，发现它们“质量相当好，炼渣等杂物的含量一般都不大。这大概说明，渤海的锻工有相当的专业水平。他们在制造尺寸很小的锻件时，已经善于正确地选择必需的热能用量。能证明在锻造过程中由于加热过度而出现的魏氏组织结构的样品，目前一件也没有发现。所有这些，都是证明当时的锻造生产技术水平高的证据”。²²⁾二是铸造，即把熔化的铁水倒入预先准备好的模具中来制造器具。铸造也需很高的技术，否则铸件会容易开裂。造车所必须的车辖、车轳等都是铸件，如果铸造技艺不过关，造出的车就不能载重。《王忻公行程录》载，“七十里至富谷馆，居民多造车者，云渤

19)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

20) 冯永谦、姜念思《辽代饶州调查记》，《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期。

21) 宋应星《天工开物》312页，岳麓书社2002年。

22) 列尼科夫《渤海人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加工业》，王德厚译，《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渤海专号 144页，北方文物杂志社出版1998年。

海人”。²³⁾富谷馆在今河北省平泉县城北不足百里的地方,距柳河馆、打造部落馆、铁浆馆都不远,这里的渤海人造车所必须的车辖、车轳等铁制部件,应当就是在打造部落馆和铁浆馆铸造的,至此这个生产链条更加完整了。

就目前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看,辽代的冶铁和铁器制造业的大部分从业者是渤海人。渤海遗民对辽代冶铁业的影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顺便说一下,辽代其它金属冶炼业也存在着渤海的影响。

辽有“大名城铜冶、银州的银冶、阴山的金冶”。²⁴⁾辽的银州在今辽宁铁岭一带,为产银之地,“本渤海富州,太祖以银冶更名”。²⁵⁾渤海的富州属怀远府,本在今俄罗斯滨海地区,是渤海的银产地。辽将富州的银冶工匠迁来新地,让他们继续从事银冶业。

渤海人的铜冶和金冶的水平也很高。

铜是渤海的大宗出口商品,从海路运到山东半岛与唐贸易。契丹人似乎也不太可能浪费这一人力和技术资源,辽的铜冶业应该也有渤海工匠参与。

渤海的金银器制作技术水平很高。如金花银碗、鎏金鍍花银把杯、鎏金鍍花银盘、舍利函银盒等器物做工复杂精美。其技术流传到了辽代。辽耶律羽之墓出土了盾形嵌玉金戒指、五瓣花形金杯、椭圆形缠枝金戒指、圆口花瓣腹金杯、摩羯形嵌松石金耳坠、金花银渣斗等器物制作都很精美。尤其五瓣花形金杯,“花式口,曲腹较深,圈足。内沿鍍刻卷枝纹,内底以模压双鱼纹为主,辅以鍍刻的放射线纹、五角纹、环纹,外围纹饰均为鍍刻,腹上部为一周宝相莲瓣纹,中部有开光,内饰卷草芦雁纹,腹底为仰莲纹。圈足饰水波纹。口径7.3,底径4,高4.9厘米”。还有圆口花瓣腹金杯,“圆口,腹弧分为五瓣,圈足,内外均鍍刻纹饰,内沿一周宝相莲瓣纹,内底双鱼水波纹。外腹为五组对雁衔花纹。圈足亦饰宝相莲瓣纹。口径7.7,底径4.2高3厘米”。²⁶⁾耶律羽之初任东丹国次相,后迁左相,始终掌东丹国大权,实际统治渤海遗民多年,所以他墓中随葬的金银器极有可能出自渤海工匠之手,反映的是辽代渤海遗民工艺水平,而这些又不可能不对辽代金银器制作的整体发展有所促进。

③ 纺织业

渤海国的纺织业较发达。渤海人能纺织丝绸,不但用柞蚕丝,也用桑蚕丝。²⁷⁾渤海还有著名的“显州之布”。渤海时期的丝绸纺织可能由官府经营,由政府设立手工工场,集中生产,产品也很可能只供王室和贵族享用,与普通百姓无关。布的纺织则不同,它是家家户户分散进行的,产量很大。渤海灭亡后,渤海遗民在辽的统治下,仍然从事传统的家庭手工纺织业,产量仍然很大。东丹国每年“贡契丹国细布五万匹、粗布十万匹”。²⁸⁾据魏国忠等估

23)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四。

24) 董万仑《东北史纲要》22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25) 《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

2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

27) 梁玉多《말레의 몇 가지 음식습관에 대하여》。

28) 《契丹国志》卷十四 东丹王。

计,十五万匹约合今200万米。²⁹⁾考古发掘为我们展示了渤海人所织的丝绸和布的实物。1975年,在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了渤海的舍利函。舍利函中的方形银盒和圆形银盒都用多层丝帛制品包裹着,³⁰⁾虽然已经腐朽,但还大致可以看出纹理。虽然渤海经常从唐和日本输入丝绸,但考虑到渤海的特产里有“沃州之棉”和“龙州之紬”,这些丝帛还是渤海人自己织的可能性更大。1992年,在辽耶律羽之墓出土了团窠卷草对凤织金锦、罗地凤鹿绣等丝织品,它们也可能是渤海人织的。1972年,在吉林省和龙县八家子北大墓中发现了一小块麻布,“长8厘米、宽4厘米,是用纯麻线织成的平纹布,每平方厘米经12根,纬12根,属粗布”。³¹⁾因为这里正是渤海的显州,所以这可能就是“显州之布”。尽管这麻布是渤海时期的,但辽代渤海人织的应该也是这个样子。

正是由于渤海人有较高的纺织技术,辽政权还直接役使渤海遗民从事纺织。《辽史》
卷三十七 地理志
一载,辽上京道祖州城“东为州廨及诸官廨舍,绫锦院,班院祇候蕃、汉、渤海三百人,供给内府取索”。绫锦院是专门纺织高级丝绸的手工业工场,织工中不少是渤海人。产品既由“内府取索”,说明是专供皇室的。

④ 陶瓷器制造业

渤海人的陶瓷器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不但能烧制普通的日用器皿、建筑材料,还能烧制技术要求较高的釉陶、三彩陶、以及瓷器。渤海遗民在这方面给辽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莲花纹瓦当是渤海陶器的一大特色,在各主要渤海建筑址中都有大量出土,而在辽饶州这个以渤海遗民为主的城市也发现了几乎完全一样的莲花纹瓦当。见图1和图2



〈图 1〉辽饶州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

(资料来源:冯永谦、姜念思《辽代饶州调查记》,《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期。)

29) 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3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0) 宁安县文物管理所、渤海镇土台子大队《黑龙江省宁安县出土的舍利函》,《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

31) 郑永振、严长录《延边古代简史》84页,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



〈图 2〉渤海泉上京龙府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六顶山与渤海镇》图版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与无釉陶相比,釉陶更美观、结实、防水性好。渤海的釉陶有两种釉:“软质含铅釉、硬质高熔点釉即长石岩釉”。³²⁾在辽饶州遗址就出土有釉陶。³³⁾在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朝克图山的辽耶律羽之墓,主墓室完全用绿釉琉璃砖砌成。³⁴⁾如上文所述,耶律羽之长期在事实上主东丹国政,所以,其墓的建造出自渤海遗民之手是完全可能的。

三彩陶器是釉陶的极品。它要求的材质较高,必须是白色粘土做坯。烧制工艺复杂,要求的技术水平很高。烧制三彩陶是当时东亚地区的一个潮流,唐有唐三彩、新罗有新罗三彩、日本有奈良三彩,渤海人也能烧制三彩。契丹人本身的陶器制作技术很低,辽早期的三彩出自渤海遗民之手。饶州遗址就出土有三彩器,“三彩为黄绿白三色,釉光洁。器形有碗、碟等”。³⁵⁾辽代中期以后出现了辽三彩。对于辽三彩与渤海三彩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李逸友先生认为,辽三彩是仿造唐三彩和渤海三彩发展起来的。³⁶⁾魏国忠先生进一步指出:“渤海的三彩烧制技艺则完全可能伴随着东丹的西迁而传播到了东京辽阳一带,从而对后来辽中叶三彩工艺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³⁷⁾而彭善国先生则认为,“从目前的材料看,似乎还不宜下这样的结论。辽三彩是在辽代后期才兴起的品种,见于纪年辽墓中最早的材料为内蒙古宁城县萧闾墓,此时距渤海灭亡已近一个半世纪,很难想象三彩工艺能跨越如此之大的时间缺环而得到传承”。³⁸⁾笔者更倾向于魏国忠先生的观点,不过,最终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2) 阿尔德米耶娃等《渤海时代滨海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7年1期。

33) 冯永谦、姜念思《辽代饶州调查记》,《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期。

3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

35) 冯永谦、姜念思“辽代饶州调查记”。

36) 李逸友《略论辽代契丹与汉人墓葬的特征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37) 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379页。

38) 彭善国《试析渤海遗址出土的釉陶和瓷器》,《边疆考古研究》第五辑131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⑤ 饮食习惯

渤海有另一种著名的土特产，即“柵城之豉”。豉即豆豉，俗称腊八豆，是一种用大豆发酵而成的调味品，“有咸淡两种……淡的可入药”。³⁹⁾它是渤海人日常食用的佐餐食品，可以用来做汤，可以用来当佐料，也可以直接食用。

豉也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比酱晚）。《齐民要术》卷八有制作豆豉的十分详细的方法，可见南北朝时豉的食用已很广泛了。到唐宋时期，豉已进入千家万户，成了最大众化的食品。据《原化记》记载，唐代崔希真请一老人吃大麦面。老人说：“能沃以豉汁，则弥佳”。⁴⁰⁾宋代还有“洞江鱼咸豉”、“十色咸豉”、“诸色姜豉”、“波丝姜豉”⁴¹⁾等多种用豉做的菜。金人也有“×鱼咸豉”这道菜。⁴²⁾今天，豆豉在中国并未退出了人们的餐桌，还有用它为佐料的菜肴和罐头，如大家都熟悉的四川名菜“麻婆豆腐”和“豆豉鲮鱼”。但总的说来，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古代，也和葵菜一样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豉是什么时候传入东北的同样不能确知，但在渤海之前未见记载，渤海与唐交往甚为频繁，所以渤海时传入的可能性最大。

据《契丹国志》卷二十七载，每年端午节，辽宫廷必用渤海厨子制做艾糕和大黄汤，供皇室食用。既是用渤海厨子制作，说明这两种食物源自渤海，只有渤海人才能做得地道。它们能在渤海国灭亡后，为其他民族接受，并被当作了只在节日才可一吃的珍品，必然味道十分鲜美，是渤海饮食中的精品。艾糕，现在还有，是朝鲜族民族食品，用艾蒿叶和糯米做成，味道很好。大黄汤是何物不好断言，不过这里的“大黄”不可能是指汤的原料或成分，因为“大黄”是一种味道极苦的中药，不可能用来做汤。“大黄”应当是指汤的颜色，是一种黄颜色的汤。笔者有一种猜测：豆豉的颜色也是黄的，古人很喜欢用它做汤。黄朝英的《缃素杂记》解释了陆机的“千里莼羹未下盐豉”的意思：“盖洛中去吴有千里之远，吴中有莼羹，自可敌羊酪。第以其地远，未可卒至，故云但未下盐豉耳。意谓莼羹得盐豉尤美也”。⁴³⁾盐豉做汤既然如此味美，大黄汤很可能就是用它制作的。

39) 《辞海》195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40)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三十九，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版。

41)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42) 楼钥《北行日记》上，引自刁书仁等编《奉使辽金行程录》25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43)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商务印书馆，1938年。

2、文化

①文学

辽代出自渤海遗民之手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极少，能够确知的只有可算作散文的《裴璆谢状》、《贺正表》⁴⁴⁾以及天祚帝文妃的两首诗。但仅此也可以看出其对辽文学的影响。

渤海国存在时期，与日本往来频繁，关系良好。其中裴璆曾出使日本两次，不但是渤日两国友好的使者，也与一些日方人士个人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渤海国灭亡，时任文籍院监的裴璆随末王大諲譔降契丹。东丹国建立，裴璆任东丹国文籍大夫。东丹国的内政外交大都沿用渤海时期的旧制，也试图维持与日本的关系，乃于辽天显三年仍派裴璆率使团出使日本。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930年1月26日）到达日本丹后国竹野郡大津滨。此时，日方不知渤海国已亡，仍以待渤海国使臣之礼待之。但裴璆等自称为东丹国使，所携文书亦有前后相违之处，详问之，裴璆等回答说：“本虽为渤海人，今降为东丹之臣。”而且，“对答中，多称契丹王之罪恶。”⁴⁵⁾日方认为裴璆朝秦暮楚，有失臣节，责其进谢状，裴璆乃进《谢状》曰：“裴璆等背真向伪，争善从恶。不救先主于搏俎之间，猥谄新主于兵伐之际。况乎奉陪臣之小使，紊上国之恒规；望振鹭而面惭，咏相鼠而股战。不忠不义，向招罪过，勘责之旨，曾无避陈，仍进过状。裴璆等诚惶诚恐，谨言”。⁴⁶⁾单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篇《谢状》确是语言简练，用典准确，表现出了裴璆很高的文学素养。当然，这样的人在渤海遗民中决不止裴璆一个，渤海存在一个有文学素养的士人阶层。那些在东丹国为官的契丹人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

天祚帝的渤海出身的文妃姓大氏，小字瑟瑟，国舅大父房之女，“聪慧娴雅，详重寡言”⁴⁷⁾乾统三年（1103）立为文妃，生一子名敖卢翰，封晋王。一女余里衍，封蜀国公主。初时深得天祚帝宠爱，以柴册仪加号承翼。她颇有文采，善诗歌，又有很强的忧国之心。天祚帝后期，女真反辽，连下州县，势不可挡，强盛一时的辽帝国江河日下，摇摇欲坠。当此危机之时，天祚帝昏庸如故，亲小人，远贤臣，田猎不止。为此，文妃作歌讽谏：

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
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
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
可以朝沙漠北兮，夕枕燕云。

44) 还有一篇是《定安国王乌玄明上宋太宗之表》，但这是写给宋人的，与辽无矣，故略。

45) 《扶桑纪略》第二十四，见孙王良《渤海史料全编》37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46) 《本朝文粹》十二，见孙王良《渤海史料全编》375页。

47) 金毓黻《渤海国古长编》卷十三，遗裔列传，《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

还有另一首讽谏歌：

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
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
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
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⁴⁸⁾

这两首诗歌把辽廷当时存在的问题表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忠贤之臣被疏远排斥，奸臣当权，大逞淫威，以至于国之将倾。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指出得明明白白：避小人，用贤臣，激壮士以挽救危机。可惜，忠言逆耳，天祚帝并没有接纳逆耳良言的胸怀，反而对文妃心生嫉恨之意。

此时，一些不知存勖国事，只知争权夺利的贵族还在争夺辽王朝那顶即将落地的皇冠。在天祚帝诸子中，文妃所生的晋王敖卢鞬“最贤，素有人望”，有可能被立为太子。皇后萧氏之兄萧奉先为保证皇后所生之子能继位，⁴⁹⁾诬陷文妃与其妹丈南军都统耶律余覲合谋立晋王为帝，尊天祚帝为太上皇。天祚帝因此赐文妃死。不久，辽王廷也灭亡了。

洪皓的《松漠纪闻》上记载了一篇渤海《贺正表》，其全文是：

“三阳应律，载肇于岁华；万寿称觴，欣逢于元会。恭维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维新，顺夏时而谨始；卜年方永，迈周历以垂休。臣幸际明昌，良深‘覃’颁。远驰信币，用申祝圣之诚；仰冀消躬，茂集履端之庆”。

金毓黻认为，此表“殆为渤海盛时，遣使臣朝唐贺正旦所用之表”，⁵⁰⁾赵志辉等亦同此说。⁵¹⁾毕宝魁认为是唐代渤海国于728年为贺唐颁布新历《大衍历》所作，⁵²⁾而翟立伟点校《松漠纪闻》时注为渤海向辽所进。洪皓《松漠纪闻》4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⁵³⁾笔者则认为，此表为东丹国向契丹所进，因为《松漠纪闻》中所说的渤海均指东丹，而且，同时还载有高丽和西夏的贺正表。与高丽、西夏同时存在的只能是东丹。它是辽代渤海遗民的文学作品。此表虽然内容空洞，但对仗工整，词藻华丽，如果单从文学本身看，是一篇不错的骈文，也是辽代渤海人文学水平的体现。

渤海遗民在文学艺术方面对契丹人的影响很明显。比如东丹王耶律倍，性喜读书，“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烙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他渡

48) 《辽史》卷七十一，后妃。

49) 《辽史》后妃传并没有记载皇后萧氏是否有子，但《辽史》皇子传载天祚帝有六子，除明确了文妃、元妃各生一子外，其余四子不知为谁所生，从萧奉先谋害晋王之举看，四子中至少有一子为皇后萧氏所生，如果皇后无子，也就用不着与晋王母子争夺了。

50) 金毓黻《渤海国古长编》卷十八，文征。

51) 赵志辉、邓伟、马海福《满族文学史》83页，沈阳出版社1990年。

52) 毕宝魁《渤海遗文〈贺正表〉写作时间考》，《满族研究》1999年4期。

53) 洪皓《松漠纪闻》4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海投后唐时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差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⁵⁴⁾短短二十个字,把自己出走的原因、心境、去向表达得清清楚楚,而且文字通俗易懂,毫无余饰,颇有杜工部的风格。

②音乐、舞蹈

渤海的音乐很有特色,不但为渤海人自己所喜爱,也丰富了周边民族的生活。“渤海乐”流传到中原,是北宋宫廷音乐之一。北宋的音乐文化发达,能够在北宋的音乐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必有鲜明的特色。但到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宋廷“禁习渤海乐”⁵⁵⁾理由是渤海的主体乐器渤海琴“沉滞抑郁,腔调含糊,失之太浊,故闻其声者性情荡于内,手足乱于外”。⁵⁶⁾从“沉滞抑郁,腔调含糊”这点看,渤海琴是一种低声部乐器,再从“闻其声者性情荡于内,手足乱于外”看,这种乐器相当有感染力。南宋朝廷禁习渤海乐,很可能是因为理学发展,思想趋于僵化的结果,并不是渤海乐本身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这一纸禁令并没有能真正禁得了渤海乐。《梦粱录》有“吹赚动鼓《渤海乐》一拍子至十拍子。”⁵⁷⁾的记事。因为《梦粱录》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南宋淳祐、咸淳年间成书的《临安志》和作者的耳闻目睹,说明至少在十三世纪中叶《渤海乐》仍在南宋民间流传着。

渤海乐也是金廷的音乐之一,有专门学习和演奏渤海乐的渤海教坊。渤海教坊的乐人还曾被选充太常,“泰和初,有司又奏太常工人数少,即以渤海、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人兼习以备用”。⁵⁸⁾渤海乐早在渤海国存在时就已传入东邻日本,成为与唐乐、吴乐、三韩乐并列的宫廷雅乐之一。其后一直流传下来。日本“现存的舞乐中,大鞞鞞、新鞞鞞、新乌苏、古乌苏、进走秃、退走秃、敷手、贵德、昆仑八仙、地久,这些舞乐被认为是从渤海传来的”。⁵⁹⁾

史料中没有关于辽廷使用渤海乐的记载,但从宋、金、乃至日本都有渤海乐的情况看,辽的音乐似也应该受到渤海乐的一定的影响。只是史籍失载,无从考稽了。

渤海人能歌善舞,舞蹈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国灭亡后,遗民们保持了这一传统。北宋王曾使辽,在柳河馆见到渤海遗民还有这样的风俗,“每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加唱和,回旋婉转,号曰踏锤”。⁶⁰⁾清代杨宾的《柳边纪略》记载宁古塔满族舞蹈的情形:“满洲有大宴会,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作势,曰舜势。中一人歌,众皆以空齐二字和之,谓之空齐”。⁶¹⁾王承礼先生认为,这种舞蹈就是由渤海人的“踏锤”舞发展而来的。⁶²⁾

54)《辽史》卷七十二,义宗僭传

55)《宋史》卷三十五 孝宗本纪 三

56)《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乐志 六

57)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鼓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58)《金史》卷三十九 乐志 上

59) 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35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60) 王圻公行稿录》见《契丹国志》卷二十四

61) 杨宾《柳边纪略》卷三,见《龙江三记》9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62) 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358页

